

张功臣 / 著

外国记者 与近代中国

1840 — 1949



新华出版社

1840 — 1949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张功臣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840—1949/张功臣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8

ISBN 7 - 5011 - 4418 - 4

I. 外… II. 张… III. 中国 - 近代史 - 1840—1949 - 史料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144 号

Et53/17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840—1949)

张功臣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18,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4418 - 4/G·1633 定价: 24.00 元

引言：换一个视角看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一部自始至终翻卷着革命风云的历史画卷。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的逐步加深，中国拉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而作为早年西方殖民政策的先锋，各国新闻界也是在目睹这一变革迅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其驻外事业在中国的渗透与构建。从那时起，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以许多震撼世界的人物与事件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各国新闻工作者。他们之中，有职业记者、自由记者和业余记者，有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政客，也有严肃的学者和革命活动家。他们的新闻活动、各自不同的经历及其有关中国的报道作品，不仅记录了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云于西方世界的投影，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与各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对于年轻的新闻学来说，这又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发的学术领域。许多年业已过去，历史的迷雾也渐渐消散，但就笔者有限的视野来看，对于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的报道，特别是近代部分，还很少有人进行过详尽的追索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讨论西方记者采写技巧及个人成才经验的专题文章开始见于有关书刊，但系统的、全面的和史论结合的专论还属鲜见。此种景况尽管是一种缺憾，但也无疑为笔者鼓起勇气面对这一陌生的题目，增添了不少兴趣与信心。

本书的基础部分是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

位期间提交的毕业答辩论文，经不断增补后，目前内容扩充了近一倍，使它看起来多多少少像一本比较完整的著述了。屈指算来，从资料收集及调研工作开始的1995年夏，到现在，竟用去了整整三年时光，这实在是由于与这一研究领域有关的专门文献难以寻觅，资料的来源全靠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进行一点一滴的积累，以期达到较为可观的收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运用现有资料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探讨外国记者的中国报道这一崭新课题的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

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发端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前后传教士的来华办报，他们当时在沿海通商城市出版各类外文报刊的活动，可视为中国报道的拓荒之举；此后，经过一些过路记者和历次战争中随行记者的承先启后，至本世纪初，由于受在中国发生的数起重大事件的影响，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部分著名通讯社和报纸，即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派设常驻记者；到了三四十年代，西方各国的在华新闻机构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播网络，驻华记者也同使馆、租界和教会等权威组织一样，成为在其本国对华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专业集团。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势力集团，这样一些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里，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化入了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之中，同时也在每一次革命的进程中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因此，从外国来华记者的报道活动这一角度入手，本书不仅试图廓清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历史背景、业务活动的特点、规律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也有可能为人们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同时，提供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

的确，换一个角度看近代中国，我们看到的这百年历史既不

是史学家用细密、严谨的态度对过去加以浓缩和提炼的标准文本，也大异于文学家尽其想像力编织出来的通俗传奇和演义之类，而是一种“活的历史”，完全以它自身的真实——场景、确切的时间、报道作品以及记者的活动范围，来重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重大史实。以这种方式回到从前，进而审视自我，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也许是一件比阅读正统的历史教科书更为有趣的事。

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报道活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描画出来，将是一幅以风云变幻的中国革命为背景的杂色纷呈的图景。活跃在这样一个背景里的外国记者，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里都是代表着其国家的在华利益从事报道活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百年来出入中国的各国记者队伍的构成也是十分复杂而奇特的，这里面既有同情中国、热爱中国，进而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进步战士，有具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改革派，也有以所谓客观、公正的态度衡量一切变化，甚至通过有色眼镜看待一切中国事物的职业观察家，更有以手中舆论工具阻止中国社会变革的掌权者……每一个记者的思想及作品都是一片独特的天地，他们集合起来构成的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总的来讲，外国记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仅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他们的报道活动也显示了国外新闻事业在当时各不相同的发展情形，他们的作品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认识近代中国的难得的佐证。通过对外国记者报道中国革命在各个历史时期面貌的追溯，以及对其相关业务活动规律、新闻作品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观察、分析和反映中国的；从采访与写作的角度，可以看到他们是用怎样的风格与技巧来表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值得学习的长处、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而那些出自杰出记者之手的名篇佳作，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实践则更具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正是这种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才鼓舞着笔者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了今天的这一收获。

外国记者对于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传播方式、特点、规律是什么？他们各自代表的媒介与中国的关系究竟如何？其报道作品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本书主要研究并试图着手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追索和勾勒中国报道的发生、发展和成长的历程，展示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也是本书预期达到的目的之一。但本书并非单纯地记录中国报道的轨迹，而是以这一历史现象为线索，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由此引发出与新闻业务密切相关、各自独立的专题，进行不同侧面的探讨。因此，这种研究是开放式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本书中，对“革命”一词的运用不仅限于一般理解的含义，而泛指了书中论述到的一切变化、转折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等等。以革命作为论题的主旨，有利于在研究中把握近代中国历史总的脉搏和走向，在写作中使方方面面的材料在这一主题下得以统一、整合，这也是笔者考察外国记者的中国报道流变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国新闻事业不同程度的发展状况，在近代中国，参与中国报道的外国记者大部分来自英、美、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苏俄等周边国家，故本书以更多的笔墨论述了这一部分记者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交往，众多国家的记者开始陆续来中国访问，在中国报道这一领域里，“外国记者”一词的指向也应随之扩展了。

如前所述，在国内新闻学界，外国记者的中国报道还是一个尚待大力开发的研究领域，承担这一陌生的、重要的课题，应该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广博的文史学背景以及严格的学术训练经历，但笔者以有限的学力涉足这样一个广阔深邃的学问时空，实

感惶惑与不足。因此，本书无论从谋篇布局到文字的驾驭能力，从理论修养到思想水平等方面，肯定还都存在不少缺陷；另外，由于种种困难和现实原因，计划中的调研和访问工作也未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如此等等，尚请专家和有识之士批评教正，以便笔者不断汲取经验和教训，作为今后前进的动力，使这一课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基础部分的选题和论证是在蓝鸿文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对于记者工作的丰富认识为笔者在这项研究中的不断深入开拓，提供了积极的影响。此间，在三四十年代与外国记者有过密切交往的爱泼斯坦、李普、沈容、于友、陆瑾等前辈，为本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方汉奇教授等学者也给予这一课题热情的关注和许多有益的建议，与此同时，本书责编黄春峰先生慧眼识“砖”，帮助笔者实现了在新华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愿望；新华出版社原总编辑程克雄先生在审读书稿过程中考订史料，斟酌字句，花费了大量心血，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承蒙《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传播与研究》、《新闻爱好者》、《新疆新闻界》等刊物的支持，本书的一部分章节此前已获发表，借此也一并向以上刊物深表谢意。

作 者

1999年4月25日

写于北京辟才胡同居所

目 录

引言：换一个视角看近代中国·····	1
第一章 初识中国·····	1
第一节 传教士东来拓荒·····	1
一、马礼逊与李提摩太：两个开山鼻祖·····	3
二、传教报人粉墨登场·····	10
三、太平天国的“洋兄弟”·····	18
四、《北华捷报》等外报上的太平军·····	24
五、马克思、恩格斯看中国·····	29
第二节 在世纪的边缘·····	33
一、驻华记者跨海而来·····	34
二、“传播种子的人”·····	40
三、战地记者克里尔曼·····	47
第三节 随着洋枪洋炮一同进军·····	55
一、“追求荣誉和权势的年代”·····	56
二、莫里森崭露头角·····	58
三、目击新闻：揭开战争的一角·····	61
四、随军记者的使命·····	66
第四节 辛亥革命中的外国记者·····	71
一、“中国的端纳”·····	71

二、在北京,在上海,在武昌	76
三、在华外报大显身手	80
四、相同的面孔,不同的声音	85
第二章 早期的中国图景	92
第一节 中国——西方视野中的一个远景	92
一、英美名记者的中国观	94
二、莫里森与端纳思想之比较	99
三、陌生的中国	104
四、秘密的苏俄	116
第二节 外国记者与北洋军阀	121
一、北洋政府与英美新闻界	122
二、顾问:外国记者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127
第三节 追寻赤色的潮	134
一、一个开端:苏俄报刊认识中共	135
二、雄伟冰山的一角	138
三、鲍罗廷:大革命的转述者	141
四、谁亲眼见过共产党人?	145
五、斯特朗与中国结缘	151
第三章 踏入风云变幻的年代	157
第一节 30年代:美国记者的中国梦	157
一、后来居上的美国人	158
二、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同行	163
三、斯诺,尚未成名的中国报道	168
四、美国记者中的“中国通”	174
第二节 日本人来了	181
一、通讯社一路打先锋	182

二、日文报纸称雄中国	186
第三节 在风暴的中心	191
一、东方与西方的声音	192
二、“九一八”，“九一八”	199
三、续后报道：淞沪抗战的真实记录	210
四、昨天的历史	214
第四章 1936 年的中国	217
第一节 自我探索的岁月	217
一、自由记者独领风骚	217
二、斯诺与《西行漫记》	222
三、松本重治：一个人的生平与时代	227
第二节 西安事变中的外国舆论走向	233
一、捕风捉影论事变	234
二、海伦·斯诺与史沫特莱的心路历程	243
三、预言：《中国的新生》	248
第三节 一次回顾	254
第五章 外国记者与中国抗战	258
第一节 多种声音，一个主题	258
一、“受难的中国”	259
二、阿特丽在扬子前线	265
三、《真理报》上的“中国来信”	270
第二节 来自战时重庆的报道	274
一、骤然缩小的报道空间	275
二、新闻检查：难以逾越的墙	284
第三节 延安——一个重要的话题	291
一、“我是从八路军总部给你们写东西”	292

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	298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第一代中共领袖	309
第四节 日本记者向国内传播了什么	316
一、人数众多的采访大军	316
二、作为侵华战争工具的媒介	320
第六章 美苏舆论逐鹿中国	324
第一节 阴影笼罩下的中国报道	324
一、冷战的因素	325
二、作为主角的美苏舆论	331
第二节 美国新闻界与中国的纠葛	335
一、喧哗与鼓噪	336
二、《生活》等媒介的表演	341
三、从希望到失望	344
四、美国名记者重返中国	348
第三节 苏联的抉择	353
一、美苏之争尽显报端	354
二、对华政策与舆论宣传	360
三、转变：为胜利者欢呼	365
第七章 结局与开端	371
一、中国报道：杂色纷呈的画卷	372
二、驻华记者的地位与影响力	377
三、作为一个势力集团的驻华记者	383
四、中国报道中不平凡的一页	387
五、失去的和得到的	392
参考书目	399

第一章 初识中国

第一节 传教士东来拓荒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便能看到，外国记者的中国报道是与西方列强在这里推行的殖民政策齐驱而至的。近代中国伊始，瓜分中国的浪潮自西东来，这其中，英美等国传教士扮演着一路先锋的角色，而出版书籍，或刊行报章，正是他们传教所借助的利器。从 16 世纪第一个长期深入中国社会的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开始，率先进入中国传教的是罗马天主教会，但它在前三百多年里的事业举步维艰，直到 19 世纪的最后四十年其组织才得以迅速扩大，据统计，到 1900 年该教的传教士已达到 886 名，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了数千座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英美新教的事业则是在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在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开放内地条约之初，在中国只有 189 名新教传教士，借天时地利之和，到 19 世纪末，急剧增长了 10 倍，500 多个布道站也星罗棋布地点缀于各省乡村。^①

^①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 611—613 页。



19 世纪末的外国传教士

应该说，传教士们担任世俗职务、特别是介入办报事业，是一种特殊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中西接触的开创阶段，传教士是开路先锋，人员和其它资源的严重不足，都要求他们担任比局面大开后复杂得多的职责。在中国强有力地抵抗西方文化渗透的年代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目标只有一个，但是，“一旦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西交往都按照条约进行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的不同兴趣便油然而生。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① 因此以下的情形就不难理解，到清季咸同之际，全国“通都大邑报章创刊七十六种，而教会创

^①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 606 页。

办者占十之六焉”。^① 以传教士之手输入中国的西式报刊及编辑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近代中国报刊出现的作用，但他们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传播教义，并宣扬西方文明，为日后接踵而来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势力作舆论准备。因此，一俟海禁大开、来华外国人在各通商城市达到一定数量，各种外文报刊的创办也是势在必行了。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在华办报打下的基础和积累的经验，无疑对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马礼逊与李提摩太：两个开山鼻祖

外国新闻媒介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 19 世纪初叶



中国报道的开拓者马礼逊画像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办报活动。外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是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人是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史学家认为，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鼻祖，早在来中国之前，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以拉丁文中文《合璧字典》为课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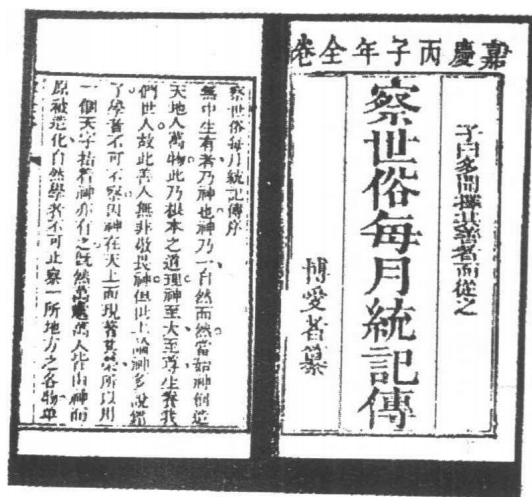
^①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第 14—15 页。

写，刻苦练习，为来华传教作准备；1807年初，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传教士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然后从纽约坐帆船在太平洋上飘泊七个多月，于同年9月抵达广州时，这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真空状态已告结束，新的一页从他脚下开始了。

在广州，马礼逊开始逐步实行他雄心勃勃但又与前辈们迥然不同的传教计划。由于当时清廷严禁外人在华传教，他不得已受雇于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任汉文翻译，同时致力于适合一个人单枪匹马来从事的工作——着手编辑对后来传教士影响巨大的《汉语语法》及《华英辞典》，又翻译《圣经》之《新约》为中文，秘密雇人刻印，因中途为官府所察，只好将所有刻版付之一炬以灭迹，据说损失甚重。伦敦布道会闻讯后，于1813年又特遣米怜（William Milne）东来协助，马礼逊惟恐再蹈前辙，遂命米怜率新发展为教徒的刻印工蔡高前往马六甲设立

印刷所，刊行书籍，并创办为中国人讲习英文的华英书院。与此同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应运问世了。

从该刊二期登载的一篇“社论”中，我们略可看出这些远离故土、缺乏帮助的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以及他们对智识界怀有的急迫期望：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

……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中国线装书版式，木板雕印，自1815年起，凡七年，每月一期，每期六至七页，初印500册，不久增至1000册，最盛时达到2000册。所登内容，大部分是阐发基督教义，间或也有新闻和介绍天文、地理等新知识的文章。编辑者除马礼逊、米怜及稍后加盟的另一名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ahurst）之外，引人注目的是粤人梁亚发。据新闻史家戈公振先生的考证，梁亚发为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正式服务于报界的第一人。他11岁起就塾读书，数年后因家贫辍学，乃往广州习制笔和雕版业，1815年被传教士米怜所招募，随之赴马六甲筹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刊，不久受洗入基督教新教，从此毕生服务于伦敦布道会，以刻印中文书报、撰写宗教小册子及传教终其一生。其中，他撰刻的《劝世良言》曾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洪秀全大量翻印，传播甚广。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后，由于外人不便出面，该刊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全凭梁亚发一人在海陆间往返奔波，主要方法是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他本人携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其余部分则由编者联络友人，借海船之便销往南洋群岛、泰国、新加坡等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第57页。